

传媒书系
SERIES OF THE BEST
MEDIA BOOKS
人民日报

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

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

Buneng Wangquede 1978-1985 nian
Woguo Xinwen
Chuanboxue Guokan

陈力丹 © 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引进课题
“20 世纪 70-80 年代新闻传播学刊物研究” 成果

不能忘却的 1978 - 1985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

陈力丹◎编著

人民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能忘却的 1978—1985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 / 陈力丹编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208-989-1

I. 不… II. 陈… III. 新闻学: 传播学—期刊—简介—中国—1978~1985 IV. G219.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50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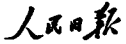
书 名: 不能忘却的 1978—1985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

编 著 者: 陈力丹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曼 嫫 梁雪云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4 6536951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21.5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989-1

定 价: 39.00 元

写在前面

“文革”结束后，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恢复和传播学的引进，都发生在1978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年代。从那年到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阶段，最初人们的思维状态如何，在想些什么，研究些什么，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经历了怎样的争论，相当程度都记载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上。然而，由于那时尚没有完善的刊号管理制度，多数新闻传播学的刊物是没有刊号的，或者以书代刊，或者是公开订阅的内部资料，甚至还有油印本状态。这些在新闻传播学界内影响了一代人的刊物，由于资料工作不受重视，很多本学科的图书资料室在历次的清理资料中，将这些期刊作为废品处理掉了。待到90年代中后期规范期刊和期刊内容上网之时，其中的多数刊物已经不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扩招规模很大，全国高校新闻院系从80年代的十几家，跃升到现在的300多家。现在的80后、90后学生，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完全不知道。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教师为数很少，图书馆或资料室也没有那时过刊的踪影。因而，年轻一代的论文引证的内容，一般只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整个70-80年代的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成为一代新闻人记忆的空白。他们重复了太多的那个时代已经研究过的话题，还误以为是创新。

我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全过程，在这些过

刊上都发表过文章，与多数过刊的编辑有过交往。鉴于这种情形，我 2003 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之时，便把研究 70—80 年代的新闻传播学过刊，申报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引进的课题内容。由于行政程序方面的问题，课题经费迟迟不得落实。2004 年，凭着新闻学院借给我的 1 万元启动课题的研究。我动员了多位硕士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包括外校的），在北京，并分赴哈尔滨、兰州、西安、上海、杭州，查找当年的过刊，巡访当年这些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同时，千方百计与在海外的当事人联系，辗转委托人查找。历经五年时间，终于将列入研究计划的 11 种过刊的基本情况弄清楚。2006 年 1 月，4.9 万元课题经费终于到位，得以开始有序地进行文献的整理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的耽搁，这期间多位过刊的当事人逝世或患老年痴呆，我们错过了获得历史记述的宝贵时间。其中万幸的是，赶在《新闻学刊》和《新闻学会通讯》的主编钱辛波逝世之前，我们采访到他，得以记录下他的音容笑貌、清晰的记忆与鲜明的观点。

我以现在不再出版、当时的影响力较大这两条作为标准，选择了 11 种过刊，其中北京以外出版的有五种。每种过刊的研究都分为两部分，一是访问当时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二是对现存过刊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梳理出过刊的基本内容，以供现在的研究者了解情况。

鉴于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都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因而我在他们出访前，要求他们熟悉现存的过刊，分别讲述该刊的大体历史和可能的主要调查要点，讨论调查提要。他们写好的访问记和文本分析文章，都经过我的文字修改、部分重写和整段补充，以及史实校正。有些访问记请当事人过目，以保证至少在史实方面不要出现较大差错。客观叙述，是这项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每个人的行文风格、文章结构不同，我基本保留。

做这项课题十分清苦，经费缺乏（课题费的一大半用于出版），为了节省费用，有些课题组成员坐着火车硬座出访，吃住最便宜的旅店。写作文本分析文章，上万字的文章也只能得到数百元的劳务费。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凭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在努力工作。现在，当初的采访者和文本分析的作者，均已工作在天南海北的不同岗位，课题方才完成。我衷

心感谢他们，他们表现了对事业的赤诚之心！按参与工作的时间顺序，他们是：王辰瑶（北京大学）、周路佳（上海公务员）、张芳辉（中央文明办）、赵星耀（华中科技大学）、朱至刚（厦门大学）、王亦高（美国密苏里大学访学）。

在这项工作中，很多被采访者看到来访问他的人，都十分惊讶，深受感动，因为他们长时间被历史遗忘了。陕西《新闻研究》的编辑陈布南80多岁高龄，认真审阅访问稿，几乎重新改写了原来的采访记，亲笔写了十几张稿纸，挂号寄来，又委托年轻人打出电子版。

在查找过刊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热心人帮忙。人大新闻学院退休教授王泰玄，看到我们所存《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缺一本，从自己已经装订好的该刊合订本中拆下这本补给我们。黑龙江《新闻传播》前任主编刘玉杰，从资料室即将处理的废旧资料中，找到了《新闻学研究资料》创刊第一年的全部期刊，并挂号寄来。南京政治学院退休教授卢惠民，将我们这里不存的五期兰州《新闻理论与实践》复印后挂号寄来。就在本课题即将结项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陈崇山，得知我们缺少《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某期，翻遍自己家里的故纸堆，找出了我们缺少的那一期挂号寄来……为了找到访问的当事人，我委托了学界、业界的不少人接力查找，都得到无私的帮助；为了找到各位刊物主编的照片，他们的后人和原工作单位的人事干部也做出了努力，使本书得以刊出珍贵照片32张。

本课题历时五年，回顾以往，无限感叹。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何在，那么可以用《新闻学研究》第二任主编徐培汀教授的话来回答：凡存在过的，必留下痕迹；凡努力过的，必产生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某段历史中。让历史告诉未来，每一位从特定历史中走过来的人，都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陈力丹

2009年3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1980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

“想任劳任怨地做一点事情”	003
——对《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主编郑北渭的越洋采访	
放眼看世界 新闻万花筒	008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暨《世界新闻事业》文本分析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作者或译者名录	024

第二章 《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1995 年，甘肃省新闻研究所）

《新闻理论与实践》编辑张默采访记	029
1984 年以后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追访记	040
《新闻理论与实践》内容分析（1979-1984 年）	048
《新闻理论与实践》内容分析（1984-1989 年）	072
《新闻理论与实践》缺失情况	102

第三章 《新闻研究资料》（1979-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采访《新闻研究资料》编辑李斯颐记录	105
《新闻研究资料》的历史与文本特征	108

第四章 《新闻学研究》（1979—1985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

- “凡存在过的，必留下痕迹；凡努力过的，必产生影响” 119
 ——采访《新闻学研究》编辑徐培汀
 丰富多彩 承上启下 125
 ——《新闻学研究》文本分析

第五章 《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 年，首都新闻学会）

- “希望中国新闻理论界真正接受几十年来的教训” 145
 ——采访《新闻学会通讯》、《新闻学刊》主编钱辛波
 《新闻学会通讯》内容介绍与分析 152

第六章 《新闻研究》（1980—1984 年，陕西省新闻研究所）

- 古城深巷谈办刊 177
 ——采访《新闻研究》编者陈布南
 《新闻研究》编辑桑义燐采访记 182
 探索与争鸣 190
 ——《新闻研究》文本分析（1980—1983）
 探索与务实 202
 ——《新闻研究》文本分析（1984）

第七章 《新闻学论集》（1980—1999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 “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 209
 ——采访《新闻学论集》第一任主编甘惜分
 《新闻学论集》内容介绍与分析 217

第八章 《新闻学研究资料》 (1980-1984 年, 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

- 久远的历史记忆.....243
 ——采访《新闻学研究资料》编辑万联众记录稿
 黑土地上新闻学研究的星火.....248
 ——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的文本分析

第九章 《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 (1981-1982 年, 首都新闻学会)

- 就《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采访胡绩伟.....269
 关于《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的短暂历史.....272

第十章 《新闻法通讯》 (1984-1988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法研究室)

- 采访《新闻法通讯》主编孙旭培实录.....281
 《新闻法通讯》文本分析.....284

第十一章 《新闻学刊》 (1985-1989 年, 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

- “办好一本学术刊物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299
 ——采访《新闻学刊》编辑孙五三
 《新闻学刊》内容介绍与分析.....305

第一章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1978-1980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

“想任劳任怨地做一点事情”

——对《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主编郑北渭的越洋采访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暨《世界新闻事业》对于“文革”后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再启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重新引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年过去了，当中国新闻传播学有了长足发展的时候，当年的启蒙学术刊物也已渐渐被人遗忘，从当年喧闹的舞台上退下，成为逐渐被人淡忘的“文献”，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规律。但是，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来说，这些带有“新起点”意味的“文革”后最早的一批新闻学术刊物即便已经少有人提，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可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而言，就体现出了时间的残酷，笔者在

寻访当年创办这些刊物的老人时，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主编郑北渭先生定居美国20多年，与国内联系很少。《世界新闻事业》的主编舒宗侨先生90多岁了，记忆力已经大大衰退。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笔者的导师陈力丹先生按照几年前的地址给郑北渭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幸运地和郑北渭先生联系上了，这样，对当年这份刊物的具体情况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得更多一些。

郑北渭先生对这件事的热情与认真让笔者非常感动。他先后几次邮寄了一些材料，并请女儿代为发送电子邮件回答笔者的问题。国内的国际电话费比较贵，也不方便，他就自己打越洋电话来“接受”笔者的采访。由于身体关系，郑先生每次在电话里不能讲太长时间，但他总会敲定一下下次采访的



图1 郑北渭（姜飞提供）

时间，并反复地问“会不会妨碍你休息，会不会太晚了啊”。就这样，陆陆续续地有过三、四次越洋交谈，才有了现在的这篇访问记。在采访中，郑北渭先生也一再表示，年岁深久，自己可能也有记不清楚的地方了，“知道的我就说知道，记不清的我只能说很抱歉了，那我不可以乱讲的”。

“想任劳任怨地做一点事情”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只在创刊号上对创刊意图和办刊宗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为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对于当时为什么想要创办这样一份刊物，以及创办的整个过程，郑北渭先生回忆说，做这样一件事其实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使然，其办刊宗旨实际上就是 50 年代那本只出了 5 期就被迫中断的《新闻学译丛》的延续。“因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一直是有这个名声的，想继承下去。像美国的一些杂志如《新闻学季刊》、《编者与发行人》等都是有名气的刊物，我们就希望能把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过来，对我们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一点影响。这个事情是王中先生支持的，他驾轻就熟。因为 1950 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在他的主持下办过《新闻学译丛》，《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实际上是《新闻学译丛》的一个延续。”

郑北渭先生早年求学美国，接触了大量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新闻传播理论。1952 年回国，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 30 多年，直到 80 年代中期移居美国。从主编当年的《新闻学译丛》到主编《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尽管驾轻就熟、“顺理成章”，但是对于这两份刊物的主编郑北渭先生来说，饱经风霜的 22 年，已经让当年风华正茂的海外学子变得“谨慎”了许多。郑北渭先生坦言：“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都解放的。那个时候政治气氛反反复复很多，一下子说要把刊物停掉啦，一下子又害怕被扣帽子啦，总之办的时候还是有点风险的，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这个人几十年来都比较谨慎，我选择的稿件的标准都是能结合实际的，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这个我是有根据的，心里有底的。”尽管早春的气候往往还有乍暖还寒的时候，但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春天毕竟是来了。郑北渭先生说：“粉碎‘四人帮’了嘛，当时感觉应该在这个时候做点事情了，出这份刊物也是水到渠成的。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动员，也没考虑过自己的荣辱得失。当时具体办这样一份刊物就是想任劳任怨地做一点事情，把我自己最大的力气使出来，能做多少做多少。”

外文水平是最大的障碍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翻译的美、日、苏等国的书刊有几十种，如《新闻学季刊》（美）、《编者与发行人》（美）、《新闻工作者》（苏）、《民主记者》等，这些外文书籍和刊物是如何得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取这些外文书刊有什么困难和限制吗？郑北渭先生直言，困难的是当时老师和学生的外文水平普遍有限。“当时获取这些外文资料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有订阅，而且在资料室里开放，教师和学生都能看到。1950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开始订阅一些外文资料，‘文革’的时候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恢复了。”郑北渭先生说，“这些资料老师学生看都能看到，但主要因为语言不通，看不懂，利用率太低了。所以我们也想办一份刊物，把这些资料翻译过来，方便大家学习，提高利用率。”

郑北渭先生介绍说，当时能够从事翻译工作的没有多少人，“这个（翻译）队伍人很少，一方面是对外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普遍还没有重视起来，另一方面是外语功底好的人也不多。当时主要靠一些研究生把这件事撑起来，如居延安、俞璟璐、倪仁这些人。他们有的本科是学外文的，功底比较扎实，翻译水平比较高，是当时翻译队伍的主力。还有一些老师也热情参与了这个事情，如舒宗侨、陈韵昭等，他们外文水平比较高，也分担了一些工作。此外还有一部分本科的学生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外文水平相对差一点，翻译起来很吃力。总的来讲，当时翻译的主力就是后来到国外去学习的那些人，其他人不是主要的力量，翻译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

郑北渭先生本人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作为《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的主编，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好“语言关”。“我作为主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挑选合适的人才来做这些翻译工作，要看他以前译的东西怎么样，还要把原文找来核对。翻译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主编这个关要把好。”在谈到停刊问题时，郑北渭先生表示，由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和国内两头跑了，“后期”（即《世界新闻事业》时期）的事情不太清楚了。但他个人感觉，除了《新闻大学》杂志创刊等外在因素外，导致刊物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是人手不够，“外文水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好的，当时外语好的人不多，走掉一些人后，刊物的发展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介绍“有用的”、“新的”东西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暨《世界新闻事业》上翻译的外国新闻资料主要是新闻传播基本理论、外国新闻事业现状与历史、新闻操作经验探讨等几个方面，内容比较全面。郑北渭先生称当时选择的内容，的确就是从这三、四个方面来考虑的，以全面为主，没有特别地侧重某一个方面。郑先生说，选择翻译什么样的外国新闻资料内容有两个大致的标准，一个就是要考虑到涉及对象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毕竟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和知识储备上都非常欠缺。另一个就是要把国外新闻传播界的“有用的”、“新的”东西介绍到国内来。所谓有用，自然是要对当时国内的新闻报道实践有所助益。例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美国科技报道的写作问题，这样的安排与国内当时弘扬科学精神、重视科技报道的社会思潮不无关系。事实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与《世界新闻事业》上介绍的国外新闻操作的一些经验，如导语的写法、新闻的结构、采访技巧等，对于刚刚从“文革”的“政治呓语式”写作中摆脱出来的中国新闻界来说，的确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从刊物上选登的读者来信不难得出这个判断。

郑北渭先生是最早把传播学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之一。早在 1956 年创办《新闻学译丛》的时候，他就开始译介大众传播理论的相关内容了。“我 1952 年从美国回来，一直着眼于新闻传播学术上的新的东西，我本身也在不断地学习。当时传播学就世界上而言也是很新的，1956 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新的东西从积极的方面给介绍过来。就这样，从《新闻学译丛》起，我们就开始点点滴滴地向国内介绍了。”但是《新闻学译丛》很快就在反右运动中夭折，对传播学的介绍也如蜻蜓点水，几乎没有在国内学界掀起波澜。20 多年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才开始继续这项中断了多年的任务。郑北渭先生称，当时主要的力量是介绍新闻学，但慢慢地也逐步介绍到大众传播学了。虽然不是第一次向国内引介，虽然介绍的内容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不再新鲜，但对于封闭了太久的国内新闻学术界来说，《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对大众传播等西方学术理论的介绍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份内部刊物”

在“文革”后的第一批新闻学术刊物中，《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和《世界新闻事业》都是铅印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显得很气派了，比起那些油印

刊物来也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郑北渭先生笑称自己是个书呆子，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对于当时办刊物的花费多少，他统统没有概念。“钱的事我没有经手，反正是公家出钱，系主任支持，经费绝对不是问题，”郑北渭先生说，“我写个条，系主任一批，经费就解决了。至于当时每期花了多少钱，实在没有印象了。”但是他记得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是1500份左右，“和早年《新闻学译丛》的发行量差不多，都是1500份左右”。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新闻学刊物中也是比较大的了。不过郑北渭先生反复强调，《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不是公开发行的，是一份内部刊物。“我们是全国性的刊物，所有省市都有我们的读者。所谓不能公开发行是指普通读者不能买，只有新闻系统内部的人才能买。当时所有的业务刊物都是如此。”作为一份在新闻系统内部交流的学术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读者的反馈是有的，包括上海市委宣传部他们看了刊物之后，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对某些观点怎么理解等，并从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刊物的发行方式上，“订购和函售都有，后来索要的人比较多了，所以很多是我们送的，送给各位译者、作者、兄弟院校和新闻单位”。不过，郑北渭先生始终强调，这份刊物只是一份内部交流的刊物，发行量和影响毕竟有限，“不能有夸大的认识，浮夸的东西，我很反对”。

王辰瑶初稿写于2005年5月

放眼世界 新闻万花筒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暨《世界新闻事业》文本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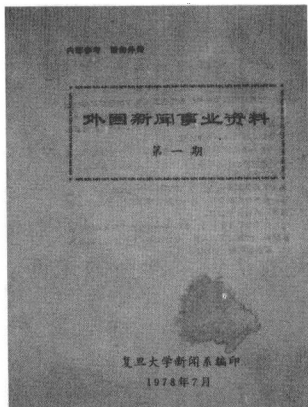


图2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创刊号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素有开眼向洋、借鉴世界各国新闻理论成果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建国后得以延续，与复旦大学新闻系老系主任王中先生有很大的关系。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内新闻学界和业界还都沉浸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思维模式中。例如，在学习《真理报》的过程中，天真地认为该报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提出要“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在实践中，更是把这一观念发展到“报纸上的一字一句都要代表党中央”等无视新闻工作自身规律的程度。理论界也是“一边倒”，翻译了大批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1954

年至1955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12编》（第1、2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等多本书，共约200万字，成为全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¹但王中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苏联报刊的路子太狭窄，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应该多总结自己的办报规律，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在王中的主持下，复旦大学新闻系1956年初办了两份刊物：《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前者以总结解放前一些著名报纸和解放区办报斗争经验为目的，后者则以学习外国新闻业成功做法为宗旨，不仅介绍苏

¹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76页。